

文章编号: 1673-1646(2024)03-0046-09

非遗生态博物馆：理论渊源、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贾璐璐, 郭永平

(山西大学 文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 非遗生态博物馆是对传统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的创新性融合,旨在解决当前非遗博物馆分布不均、管理机制不完善、人才队伍建设滞后、展示水平有限、地方特质发挥不足以及数字化程度较低等问题。非遗生态博物馆以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化为宗旨,将非遗与社区生态相结合,通过空间构建、数字构建、场景构建和产业构建等多种手段,构建出一个全新的博物馆形态。它打破了传统的空间限制,呈现出“全景敞视”的特点。这一创新模式优化了非遗博物馆的保护方式,实现了从建筑到空间、从空间到空间叙事、再从空间叙事到空间体验的三重转向,为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关键词: 非遗生态博物馆; 理论渊源; 内在逻辑; 实践路径; 全景敞视

中图分类号: G26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673-1646.2023113

引用格式: 贾璐璐, 郭永平. 非遗生态博物馆: 理论渊源、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0(3): 45-53.

Theoretical Origins, Internal Logic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Ecological Museu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JIA Lulu, GUO Yongp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museu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novatively integrates traditional museum with ecological museum, aiming to address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s, limited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mechanisms,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exhibition levels, utilization of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low levels of digitization. With the aim of preserving local cultures, ecological museu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mbin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ith community ecology, and establishes a new form of museum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digit, scene and industries. It breaks through traditional spatial constraints and presents a panoramic open perspective. This model improves the conservation method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s, achieving a triple shift from architecture to space, from space to spatial narrative, and then from spatial narrative to spatial experience, adding new vitality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ecological museu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oretical origin; internal logic; practical path; panoramic open perspective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没有固定的物质载体,但其保护与传承却需借助一定的物质形式。

收稿日期: 2024-01-06

基金项目: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实践研究(2023YY233); 山西省社科院与太行干部学院专项研究课题: 太行红色文化的精神谱系与赓续传承研究(THJS2023Z06)

作者简介: 贾璐璐(1997—),女,博士生,从事专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组织。E-mail: 202310115003@email.sxu.edu.cn.

通信作者: 郭永平(1979—),男,教授,博士,从事专业: 区域社会史、非物质文化遗产。E-mail: xzgy@sxu.edu.cn.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非遗的保护形式正悄然发生变化,数字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为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博物馆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机构,在非遗保护工作中逐渐展现出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它不仅是非遗与政府、传承人以及广大社会民众之间的关键桥梁,更是非遗保护理念与实践的重要推广者和引领者,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具有“人才科研优势、保存收藏优势、展示优势、群众优势”^[1]。反过来,非遗的加入也助推了综合性博物馆朝着“全遗产观”下的现代博物馆转型^[2]。21世纪以来,面对非遗保护空间备受挤压、传统博物馆静态的收藏展示方式遭受质疑等问题,非遗博物馆化、博物馆非遗化成为解决问题的双赢选择。学界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内容涉及博物馆的“非物质”实践转向^[3]、非遗保护的博物馆叙事^[4]、非遗的馆舍化^[5]、活态博物馆建设^[6]、博物馆非遗传播效应^[7]、社区博物馆的非遗保护实践^[8]等。这些研究深入探讨了非遗博物馆保护的策略及优势,但对博物馆保护面临的问题,尤其是数字化背景下博物馆保护的社区伦理原则及其保护效应的探讨较少。因此,本文借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全景敞视”概念,旨在强调对“非遗+社区+环境”的整体把握,进而探索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非遗生态博物馆的可能性。福柯在边沁“圆形监狱(panopticon)”的基础上提出“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主要指: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这种环形建筑具有横向上的不可见性和向心的可见性,通过“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9]226}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这种封闭的、割裂的、孤立的空间结构暗示了每个置于其中的人都被无所遁形地严密监控着,从而使得权力的运作更轻便、迅速且高效。事实上,博物馆也是一种规训技术,它暗含着三种规训路径,一是政府作为“瞭望塔”主导博物馆建设与管理,二是观众作为“监视者”影响博物馆的发展与完善,三是社区作为“文化所有者”参与博物馆的产生和演变。本文借用这一概念,去除其贬义,特指借助其智慧化与数字化的运作模式,探讨构建一种能够高效运作且兼顾多方利益主体的“非遗生态博物馆”。通过打造与所在区域及社群紧密结合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传承空间,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与持续发展。

1 非遗博物馆化与博物馆非遗化

在中华文化崛起、传统文化回归、文化自信增强的时代背景下,博物馆与非遗之间的互动愈发频

繁。非遗博物馆化以及博物馆非遗化不仅有助于平衡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了公众对多元化、动态化展示方式的期待。

随着全球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博物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背景下,博物馆不仅是城市的文化地标,更是对外交流的重要名片,其数量和质量已经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标志。自现代博物馆诞生以来,物质属性一直是第一性。随着博物馆社会功能的不断演变,新博物馆学对传统博物馆学“以物为本”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坚持以“人”为核心,注重“人”与“物”的相互关联,提倡以博物馆促进社群的多元化与和谐共存^{[10]36-43}。在这一思想潮流的推动下,生态博物馆逐渐兴起,博物馆界对非遗的认识日益深化,进而催生了非遗博物馆。自从2004年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对非遗的深刻认识与自觉保护成为非遗博物馆建立的初衷。迄今为止,国际博协(ICOM)陆续发布了9个版本的“博物馆定义”,分别发布于1946年、1951年、1961年、1974年、1989年、1995年、2001年、2007年和2022年。需要注意的是,直到2007年的版本,非遗才被正式纳入博物馆的定义范畴。这标志着博物馆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有了新的提升和发展。2022年,在原有定义的基础上,增加了“社区参与”的理念,即“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11]。早在1984年的《魁北克宣言——新博物馆学基本原则》中就已提出“生态博物馆学、社区博物馆学和所有其他形式的积极博物馆学在世界各地的经验,成为管理未来社区的重要发展因素”^[12]。在文旅融合和体验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博物馆不再以物质文化遗产为唯一驱动,还注重非遗活化保护与文旅消费的诉求。推动这一转变的原因,有新博物馆学兴起的影响、非遗保护的社会责任、体验经济时代的需求等。非遗博物馆在兼顾“物”的展示的同时,对具有精神性、无形性、活态性的文化现象和技艺过程进行阐释,为观众提供具有情感共鸣、直观感受、互动参与以及展示演绎的多元观展体验。从最初的简单陈列展示,到引入非遗匠人进行现场创作与技艺展示,再到举办以非遗为主题的临时展览,博物馆与非遗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共同推动着文化事业的发展。

从非遗的角度看,非遗博物馆化与博物馆非遗化

二者看似相似,但实则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了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路径。非遗博物馆化指的是借助博物馆这一文化平台,利用其收藏、展示、研究及传播的多重功能对非遗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的展示与保护。通过博物馆的精心策划与展示,吸引公众对非遗的关注,提升公众对非遗的认知与理解,进而增强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博物馆非遗化则是一种反向的思考。它强调博物馆在保护和传承非遗的过程中,应该更加关注非遗的活态传承和社区参与。博物馆不仅要收藏和展示非遗,还要与社区合作,通过文化赋权与意义共享的方式,合力构建知识整合与社群记忆体系,激发地方群体对非遗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这与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不谋而合。生态博物馆是“无界之馆”,其独特之处在于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物理界限,将展览空间延伸至社区与自然环境之中,实现了博物馆与社区、自然的和谐共生^[13]。它具有两个特质,“一是无墙的;二是以当地社区为主”^[14]。在此模式下,博物馆的角色从单一的展示空间转变为与社区紧密相连的文化交流平台。例如,通过与传承人合作开设非遗工作坊、组织非遗表演活动等,让游客在亲身体验中感受非遗的魅力,既促进了非遗的传承与发展,也拉近了博物馆与社区的关系。

由此观之,从非遗的角度看,非遗博物馆化和博物馆非遗化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完整体系。在传统博物馆向生态博物馆转型的过程中,非遗的博物馆保护策略已经转变为以“发现地方”为特质的多元生态博物馆实践。

2 非遗博物馆建设的现实问题

非遗博物馆将某区域的非遗聚集在一个多功能人性化的空间内进行展示,通过影像、录音、文字、图片、实物、非遗技艺活态展示等多种方式保护和展示。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诸多非遗博物馆,根据其规模及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展示某一非遗项目的小型专题非遗博物馆,民间常称为非遗传习所,例如,山西寿阳黑水村的傩舞爱社传习所、江西临川区抚州采茶戏传习所等。这类博物馆一般由非遗传承人组织筹建,通常坐落于社区及乡村地带,规模相对较小,展示类目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二是集中展示地区总体非遗面貌的大综型非遗博物馆,规模大小不同,强调多而全,注重非遗项目的多样性与完整性,一般建立在省、市、县区,如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浙江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等。这些博物馆以地区为单位,将各种非遗项目汇聚一堂,让游客能够一次性领略到该地区的非遗风貌。三是由不同类型的非遗博物馆组成的非遗博览园,如成都国际非遗博览园、济南非遗博览园等。这些博览园不仅集中了各种类型的非遗博物馆,还配备了丰富的文化活动和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非遗。四是依附于相关机构、产业而存在的非遗展示空间,一般是内部展示场所,如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中国阿胶博物馆等。它们以非遗相关机构或产业为依托,将非遗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既展示了非遗的魅力,也推动了非遗的产业化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非遗博物馆的多元性不仅彰显于其规模与内容层面,更隐含于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与社会作用之中。非遗博物馆不仅肩负保护并弘扬非遗的重要使命,也是连接历史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纽带。它们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和内容,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非遗,从而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非遗博物馆建设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其一,非遗博物馆的设置存在地区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在一些经济发达、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非遗博物馆的建设如火如荼,成为当地的文化名片。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文化基础薄弱的地区,非遗博物馆却仍处于待建、未建状态,地方非遗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展示。例如,非遗的小型传习所,由于政府财政投入有限,往往需传承人自筹资金来维持运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遗博物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部分非遗博物馆的建设位置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山西省左权县非遗中心位于离县城5公里的五里墩村,位置偏僻,且平时并不开放。还有一些非遗场馆的布局尚显分散,彼此之间缺乏联动。如寿阳县平头镇的黑水村、罕山村、韩沟村均分布有非遗传习场所,但因相距较远,很难形成联动。有的非遗博物馆被建在景区内,虽然可以借助景区的游客流量进行宣传和推广,但由于没有免费向公众开放,民众满意度不高,传承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比如祁县渠家大院内的祁太秧歌传习所。

其二,非遗博物馆的管理机制不完善,人才队伍建设滞后。非遗博物馆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需要完善的管理机制作为保障。然而,目前部分非遗

博物馆在管理机制方面存在不足,如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流程不规范等,这些问题制约了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非遗博物馆保护工作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需要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队伍支持。然而,目前部分非遗博物馆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方面,缺乏专业的非遗保护和研究人才,使得保护工作难以有效、深入开展;另一方面,对现有人才的培训和教育不足,限制了他们在保护工作中的作用发挥。这不仅影响了非遗博物馆的专业形象,更制约了保护工作的持续性和创新性。

其三,非遗博物馆的展陈水平影响活态传承效果。目前,部分非遗博物馆的展陈水平还有待加强。一些博物馆的配套设施陈旧,展览方式传统,主要以静态展示为主,缺乏互动性和趣味性;一些博物馆的展览内容单一、主题不突出,缺乏创新性和吸引力;一些博物馆缺乏专业讲解人员,展览解说不够详细深入,难以让游客深入了解非遗的内涵和价值;还有一些场馆的宣传材料不清晰、宣传标语仅在馆内,宣传力度不足。这些博物馆往往流于形式,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非遗意义信息传播的中断,难以发挥吸引社会、宣传文化的作用。

其四,博物馆的地方特质发挥不足,与社区生态融合不够。快速城市化使得博物馆成为地区的吸引力中心,但也导致地方认同弱化、同质化威胁差异性的现象发生,催生了“无地方”的产生。这集中体现在“无意义的地方与环境中、无地方的地理中,以及平面化的景观与无意义的建筑样式里”^{[15][177]}。许多博物馆在展示地方非遗项目时,往往只停留在表面层次的介绍,没有深入挖掘其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缺乏深入细致的展示。过于刻板的展演传承方式,导致传统非遗项目发生变形与异化,也难以让观众深入了解非遗项目的独特魅力和重要价值,激发观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同时,博物馆与社区之间的联系稍显薄弱,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合作机制。由于非遗的传承往往依赖其固有的文化生态环境,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许多非遗项目失去了原有的传承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博物馆在非遗传承方面的功能发挥,同时也难以在社区中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

其五,非遗博物馆数字化资源质量不高、应用程度低,影响非遗的阐释效果。大部分博物馆非遗数字化展示形式相对传统,主要依赖于文字、照片等形式,录像、录音等多媒体形式的应用相对较

少,更先进的如三维扫描、动作捕捉等新技术尚未得到广泛应用。这导致非遗的展示形式单一,缺乏立体感和动态感,只能提供一些基础信息,难以全面、系统地展示非遗信息。此外,由于数字化技术的不成熟或资源投入不足,一些博物馆的数字化资源存在清晰度低、色彩失真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观众的观感和体验。

3 “全景敞视”理念下非遗生态博物馆的内在逻辑

在“全景敞视”模式下,即便监视者并未实际现身,被观察者亦会自觉认为其存在,进而在无意识中接受外来控制并规范自身行为。观看行为本身就象征着一种权力,被观察者必须遵从这种权威所施加的管理和约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外部的规章制度就逐渐内化为个体的自律要求,形成一种自我约束的机制。非遗生态博物馆借用这一概念,旨在建立一个权力隐形在场下的非遗保护机制。这个机制弱化了“全景监狱”概念中的监视与监控色彩,强调通过多元行动方的协同实现非遗最大程度的自主发展。它是对传统博物馆和传统生态博物馆的重构,是一种以保护非遗为核心,结合生态学原理将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和社会生活融为一体的博物馆形式。

根据表 1 可以得知,与传统博物馆相比,非遗生态博物馆突破了传统博物馆以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物、艺术品等实体展品)为主的局限,将非遗与生态环境、社会背景紧密相连,呈现出更加生动、真实的文化生态。其依赖的传播媒介不仅包括博物馆建筑本身,还包括与建筑相关联的社区。与此同时,传统博物馆的建设完善主要依赖于观众参与,而非遗生态博物馆则涵盖了观众、非遗传承人、社区民众等多重主体;保护的主体从单纯的物拓展到人物结合;展示方式由静态展示为主(实物展品、图片、文字等传统媒介)向动静结合(表演、互动体验)转变。与传统生态博物馆相比,它们在传播媒介上具有相似性,都利用实体展览、数字媒体、社交媒体等手段发挥其保存、展现和诠释功能。在作用主体上,均涵盖社区居民、观众、游客及管理者等多元主体,不同的是非遗生态博物馆还尤为依赖非遗传承人的积极参与。在保护对象上,两者均致力于维护“物+人”的完整性,将馆内的陈列品与馆外的社区环境紧密相连,打破了建筑馆与

环境之间、可移动物与不可移动物之间的界限。其主要不同在于,生态博物馆的保护对象是某一特定区域内的自然、环境、建筑、景观、文化、历史等一切自然和文化遗产,包容性更强、涵盖面更广;非遗生态博物馆的保护对象则是活态运转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目标更具针对性。相对而言,传

统生态博物馆虽然也强调生态环境的营造和社区参与,但不专门针对非遗进行深入挖掘和展示非遗。生态博物馆则将非遗置于核心地位,通过模拟传统生态环境和社区参与的方式,为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持。

表1 传统博物馆、生态博物馆与非遗生态博物馆的区别

类型	内容	媒介	主体	对象	展示方式
传统博物馆	历史文物、艺术品等实体展品	建筑	管理者、观众	物	静态展示为主(实物展品、图片、文字等传统媒介)
生态博物馆	某一特定区域中的一切自然和文化遗产(自然、环境、文化、历史、建筑、景观等)	建筑+社区	管理者、居民、游客	物+人	动态展示,如生态导览、互动体验,强调主题、场景、身临其境
非遗生态博物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	建筑+社区	管理者、观众、非遗传承人、社区民众	物+人	动静结合(表演、互动体验)

通过对比,可以归纳出“全景敞视”非遗生态博物馆的三个重要特点:第一,它是一个无墙的、开放的博物馆,注重对活态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强调文化生态的整体性和活态性;第二,它注重生态环境的营造,通过模拟传统生态环境,为非遗展示提供真实、自然的场景;第三,它强调社区参与和共享,通过让社区居民参与博物馆的建设和管理,实现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共享。通过政府、专家、传承人、观众等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作,非遗生态博物馆构建了一个特殊的文化场域,也为“民主化的对话式博物馆”^[16]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在这个场域中,主与客、观者与演者、消费者与提供者多方主体的互动与博弈,使得非遗生态博物馆摒弃了以往“以物为中心”的固有传统,强调“人”与“物”的关联,实现对传统馆舍展呈的脱嵌与重构。观众不再是单纯的观看者,而是作为参与者、体验者与展品和传承人产生互动。在各方力量以非遗保护为焦点展开对话的过程中,非遗生态博物馆获得了一个相对协调的“中枢性”位置。它不仅消化了当地行政管理机构的价值与需求,还积极推动社区参与自下向上的非遗保护。借助博物馆自身所具有的话语互动性,通过“就地取材、活学活用”的非遗保护实践,非遗生态博物馆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非遗保护在当地整体文化情境中“水土不服”的问题,从而构建了一个话语协调的互动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非遗生态博物馆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路径也有一定相似性。它们都致力于保护和传承非遗,致力于维持文化的多样性和活力。然而,这种相通性并不意味着概念的等同,它

们在具体的实施方式和目标上仍有所不同。在定义与保护理念上,非遗生态博物馆是一个具体的空间实体,通常以一个特定的地域或社区为背景,通过在具体的空间和场所中进行传统技艺、表演艺术、民俗信仰等的活态展示和传承,以生态化的展示方式实现非遗的活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文化生态保护区则是一个更宏观的概念,指为保护非遗及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而划定的特定区域。它以非遗为核心,通过保护非遗生态系统来维护特定地区或民族的文化活性,在保持非遗活态传承的同时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文化与生态的和谐共生。在保护对象与方法上,非遗生态博物馆致力于对非遗进行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研究和展示,旨在让观众深入了解非遗的历史渊源、技艺特点和传承价值。文化生态保护区不仅保护非遗本身,还涉及与其相关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等多个方面。它的覆盖范围广泛,往往延伸至多个社区和地区,需要政府、社区、专家等多方合作,共同制定和执行保护策略。通过采取综合性的保护策略,侧重对非遗及其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保护。在功能与作用上,非遗生态博物馆不仅能通过生动的展示方式和丰富的互动体验实现对非遗的展示和传播,还为非遗传承人提供了展示技艺、交流经验的场所,为年轻人提供了学习和传承非遗的机会。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功能则更加多元,通过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管理措施,不仅可以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还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推动文化产业、文化旅游的蓬勃发展。尽管非遗生态博物馆和“文化生态保护区”在

保护路径上有所相似,但它们在实践中各有侧重,形成了互补关系。二者都以政府、国家公权力作为隐形“监视者”,在这里,“监视”并非贬义,而是以宏观调控为基本准绳,为探索非遗保护新路径贡献中国智慧。它们通过模拟非遗项目原生的生态环境,促进非遗在博物馆和保护区内的自发展、自调适,最终达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实践目标。事实上,非遗生态博物馆是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微观、具象载体,也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博物馆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的集聚,催生了“共享型水平合作模式”博物馆集群^{[17]43}的形成。在文化生态保护区这个文化生态系统中,博物馆的具体可及性使其成为从微观切面观察社会有机体的全新路径。

4 新时期非遗生态博物馆建构的实践路径

随着时代变迁,我们经历了资源型时代到产品化时代的转变,如今,注重消费体验的场景化时代正悄然来临。在这个大背景下,非遗保护不再局限于转化为各种艺术品、纪念品等,而是更加注重场景化的呈现。非遗生态博物馆不仅仅是对非遗本身的生活性、整体性保护,还注重对非遗创生环境的建筑格局、整体风貌、生态环境进行全面保护和呈现。针对当前非遗博物馆建设存在的问题,保护非遗及其所处文化生态的整体性和活态性,需要建构新时期非遗生态博物馆,以整体性保护的方式实现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4.1 空间建构:以有限展示无限

非遗博物馆的空间建构并非简单的物理空间布局,还需要综合考虑文化、历史、艺术等多方面因素,打造富有内涵又极具吸引力的展示空间。非遗博物馆建设既要在空间规划上考虑非遗非物质性和活态性的特殊性质,还要注重观众的参观体验,关注传承人和社区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非遗博物馆的空间建构应遵循“活态”“以人为本”的原则,采取动静结合的方式,充分考虑观众的参与性和体验感。“将博物馆与当地环境和社区相联系是寻求博物馆与当地社区协同发展的自然结果……它必须建立在地方行为主体相互理解和相互体惜的基础上,共同养成一种与自己进行有机对话的社区视角。”^{[18]217}目前,大多数非遗馆侧重于将非遗相关作品与辅助展品等物质形态置

于特定空间内进行展示,却未充分展现这些实物背后所蕴含的知识、技艺与流程等精神内核。非遗生态博物馆充分考虑参观者的需求和体验,通过合理的空间规划将静态展示与动态体验相结合,让观众在参观过程中既能欣赏到精美的非遗展品,又能亲身参与到非遗技艺的互动体验中。通过设置导览系统、休息区、互动体验区等,为参观者提供便捷、舒适的参观环境。如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在图片展和非遗作品展等静态展示方式的基础上,增加了手工技艺类项目展示、表演类项目展示、文化体验活动、民俗节庆活动、非遗讲座等动态展示方式,以活态展为主、静态展为辅。通过多种展览方式相结合实现了博物馆由“以文物藏品为本”向“以人为本”的理念转换^[19]。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围绕“生活”这一核心,将“人与过程”作为关键抓手,引入传承人进行现场展演,通过现场演示、互动教学等方式,让观众亲身感受非遗的魅力和价值。

其次,重视对博物馆内外部空间的复合利用。博物馆的内外部空间是博物馆整体空间语境的有机构成,外部空间是室内空间的延伸。外部空间没有室内空间的边界和条框限制,展现出卓越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从而能够满足更加多元化的需求。非遗生态博物馆可以作为展示地方文化、历史脉络以及自然风光的窗口,让观众在参观博物馆的同时,感受当地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例如,设计独特的景观装置、艺术装置或互动设施吸引观众驻足观赏、拍照留念,设置临时展区、户外剧场、互动体验区,举办各类非遗表演活动等,进一步拓展博物馆的社会服务功能。对博物馆内外部空间进行复合利用不仅是对空间的高效配置,更是对博物馆功能和体验的全面优化。在为观众提供更多元化的文化体验的同时,有助于增强博物馆与周边环境的互动与融合。

4.2 数字建构:媒介化展呈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数字化生存”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数字技术在非遗博物馆展演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文化传播新生态构建过程中,依托数字媒介空间实现非遗的活态保护、重新诠释与广泛传播,对于建立小族群、小地域非遗的发声机制,促进文化多样性在虚拟世界中的展现,营造非遗传承发展的新生态具有重要价值^[20]。鉴于非遗的非物质特性,传统博物馆在策划

非遗展览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数字建构方式可以克服空间限制,将无形的非遗转化为有形的可视、可听的数字资源,以更加鲜明、生动、具象的方式呈现给公众。

数字建构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对现实世界中的物体、场景或事件进行模拟、重建或创新。在非遗博物馆中,数字建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展品的呈现、场景的模拟以及互动体验的设计等方面。多种多样的现代媒介为非遗的数字化建构提供了条件。媒介化展演能够突破传统展示方式的限制,将手工技艺、传说故事、歌舞戏剧等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给观众,为观众带来更加沉浸式的观展体验。例如,通过扫描展品上的AR二维码,观看非遗传说故事的动画演绎。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将非遗以三维立体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利用互动屏幕和传感器技术设计一系列互动体验项目,让观众通过佩戴VR眼镜身临其境地感受传统技艺的制作过程。同时,非遗生态博物馆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在线直播等新媒体平台,将展览内容传播到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中,或通过建构虚拟博物馆,对非遗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展示和解读。这些线上线下互动融合的展呈方式,不仅丰富了观众的感官体验,也拓宽了非遗的传播渠道,有效提升了公众对非遗的认知与理解,同时吸引了更多年轻群体的关注与参与。

4.3 场景建构:流动的生态博物馆

文化的“生命力”根植于其独特的文化生态之中。非遗保护需要对文化的本体及其所处的文化空间、与之相应的自然环境予以整体性保护,从而确保其持续繁衍与发展^[21]。非遗生态博物馆以其场景化的呈现方式、社区群众的主动参与、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协调发展以及整体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等优势,为非遗保护营造出一个活态保护传承的社会场域。

生态博物馆对地方展示空间的制造具有地域的场景性^{[22][148]}。场景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广义层面,泛指那些与文化有关的具有美感并能给人带来愉悦的人文和自然景物;二是狭义层面,指存在于一定区域,与文化有关的活动、设施、组织、机构等^[23]。博物馆是狭义的场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历史、文化和艺术的重要窗口。非遗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特殊的博物馆形式,则巧妙地融合了广义和狭义场景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一个展示非遗的

场所,更是一个活态化、生活化的传承空间。非遗的动态性、过程性和可参与性决定了非遗博物馆在保护和传承非遗时必须充分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生态博物馆的场景建构旨在通过精心设计的展示方式和空间布局将非遗的魅力充分展现给观众,同时又兼顾非遗传承的生态化、生产化、生活化需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生态博物馆在场景建构上需要充分考虑非遗的特点和传承需求,坚持整体性原则,不断优化非遗展陈场景,贯彻实施“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保护理念^[24],即要打造在地的、流动的社区非遗博物馆,其建设与运行要秉持立体式、整体性的理念,不仅要凸显社区居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建立有效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鼓励社区居民主动参与到社区非遗博物馆的建设中;还要对社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实施整体性保护,关注社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为非遗场景的实践呈现,非遗生态博物馆具有流动性和活态性。它摒弃了传统的、固定的展呈形式,突破了文化展示与凝视、文化主体与客体、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城市与乡村文化的简单二分结构,融合了图像、音乐、服饰、技艺、情感、商品、资本、景观等与物质文化再创造相关的符号元素,通过人在社区中的流动,以活态展演的方式将博物馆和社区联结起来,建构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展示平台^[25]。

4.4 产业建构:馆游结合

文旅融合大背景下,博物馆与文化旅游产业的交互水平日益提升,博物馆的赋能作用愈发凸显^[26]。民族生态博物馆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正逐渐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旅游发展模式^[27]。这种模式核心理念在于“严格的可持续”,即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强调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28]。消费文化背景下,博物馆越来越成为文化消费的重要场所。将博物馆的建设与运营纳入到文旅产业发展中,成为打造城市、乡村文化品牌的前瞻性战略选择。

促进馆游结合,一要通过博物馆内外部空间功能的复合利用,以博物馆为中心构建一个集教育、学习、研究、休闲、娱乐、购物、体验于一体的泛博物馆旅游产业聚集区。博物馆通过与当地的旅游机构、文化创意企业等合作,共同开发非遗文创产品。同时在非遗旅游产品的开发中融入非遗技艺的体验活动、非遗主题的演出等互动项目,让

游客在参观游览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到非遗的魅力。二是要通过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旅游线路和产品,将非遗博物馆与周边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等旅游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一条完整的旅游产业链。博物馆要发挥馆藏资源丰富、学习方式多样的优势,打造成为非遗研学基地,为学生们提供跨学科学习和实践探索的机会。通过直观观察、亲身触摸和互动体验,让青少年在非遗博物馆游学中深刻感受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瑰丽,提升对非遗的认知度及保护意识。

通过馆游结合,非遗生态博物馆不仅拓展了传统博物馆的功能和内涵,也在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非遗生态博物馆的建设能够延续城市文脉,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作为城市的文化地标,非遗生态博物馆独特的建筑设计、深厚的文化内涵、独特的互动体验,不仅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更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成为城市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广大乡村地区,非遗生态博物馆的设立与运营,不仅能深度挖掘和系统整理地方非遗,展现当地的历史脉络、民俗风情以及独特的手工艺文化,增强乡村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还能吸引游客,带动周边产业、乡村旅游的发展,从而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提高民众收入水平,实现经济与文化的良性互动与有效循环。

5 结 语

在“新博物馆学”运动的社区化和大众化思想指导下,同时为适应非遗保护的现实需求,21世纪以来我国的博物馆建设和布局实现了“非物质”实践转向。非遗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是对传统博物馆功能的拓展和升级,它实现了博物馆从单一建筑向多维空间、从物理空间到文化空间叙事、从空间叙事向空间体验的转变^[29]。传统的博物馆建筑往往注重建筑本身的美学价值和历史意义,而非遗生态博物馆则将关注点转向了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传统“阐释性展示+展演+活动”的区块性展呈方式转为叙事性连缀展示模式。这种互动式、沉浸式、代入式的叙事模式将展品与空间融为一体,形成一个逻辑严密、内容完整的故事体系。参观者在观展过程中,不仅能够欣赏精美的非遗展品,还能通过空间叙事深入了解非遗的历史背景、制作技艺、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更能以具身体验的方式亲身参

与非遗保护实践。由此可见,通过空间构建、数字构建、场景构建和产业构建等多种手段,非遗生态博物馆不仅文化内涵更加丰富、故事特质更加鲜明,还是一个“全景敞视”的文化空间,这个空间没有围墙限制,充满活力和生命力。在这个空间中,政府、观众、社区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是传承者,也是弘扬者;既是构建者,也是行动者。通过“有边界的无边界”呈现,非遗生态博物馆不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建筑实体,而是融合了周边社区与环境的流动的文化保护实践体系。非遗生态博物馆不仅推动非遗资源由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转变、展示范式从语境向生境转变,同时能够把传统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效益优势,在实现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良性互动的同时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赵冬菊. 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动[J]. 广西民族研究, 2006(2): 198-204.
- [2] 王美诗. 话语视角下的非遗活态展览: 以南京博物院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为例[J]. 文化遗产, 2016(3): 81-86.
- [3] 武洪滨. 博物馆叙事语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2, 36(1): 183-192.
- [4] 方云.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的民俗博物馆叙事研究: 以上海土布馆群为例[J]. 东南文化, 2020(5): 180-185.
- [5] 岳永逸. 本真、活态与非遗的馆舍化: 以表演艺术类为例[J]. 民族艺术, 2020(6): 79-87.
- [6] 葛米娜. “活态”博物馆建设与民族地区非遗保护耦合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14(9): 121-124.
- [7] 朱莉莉. 非遗公众活动: 强化博物馆非遗传播效应的思考: 以南京博物院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为个案分析[J]. 民族艺术研究, 2018(5): 60-69.
- [8] 冯琳, 赵经纬. 活态共构: 社区博物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J]. 西北民族研究, 2022(4): 93-101.
- [9]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 [10] 甄朔南. 新博物馆学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C]//北京博物馆学会. 北京博物馆学会第三届学术会议文集. 北京: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 2000.
- [11]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Museum Definition[EB/OL]. 2022-08-24[2024-04-10]. <https://icom.museum/en/resources/standards-guidelines/museum-definition/>.
- [12]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Declaration of Quebec

- Basic Principles of a New Museology 1984. [EB/OL]. 1984-10-12[2024-04-10]. https://www.minom-icom.net/files/en_declaration_of_quebec_en_minom_1984.pdf.
- [13] 金露. 生态博物馆理念、功能转向及中国实践[J]. 贵州社会科学, 2014(6): 46-51.
- [14] 彼得·戴维斯. 地方, 文化展示点和生态博物馆[J]. 李明倩, 译. 中国博物馆, 2019(1): 36-42.
- [15] 爱德华·雷尔夫. 地方与无地方[M]. 刘苏, 相欣奕,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16] 户晓辉. 民主化的对话式博物馆: 实践民俗学的愿景[J]. 民俗研究, 2018(3): 5-14.
- [17] 王小明, 宋娴. 重构与发展: 博物馆集群化运营研究[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5.
- [18] 郑柳河, 安·罗森·拉夫. 博物馆的系统思维: 理论与实践[M]. 胡芳, 李晓彤,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2.
- [19] 谢小娟. 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以南京博物院非遗馆为例[J]. 东南文化, 2015(5): 113-118.
- [20] 汤书昆. “数字化生存”条件下中华多民族非遗传播的新生态[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32(3): 1-17.
- [21] 黄永林. “文化生态”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文化遗产, 2013(5): 1-12.
- [22] 尹凯. 生态博物馆: 思想、理论与实践[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 [23] 徐晓林, 赵铁, 特里·克拉克. 场景理论: 区域发展文化动力的探索及启示[J]. 国外社会科学, 2012(3): 101-106.
- [24] 徐金龙, 汪婷婷. 场景理论视域下非遗馆建设研究[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6(6): 33-39.
- [25] 张洁. 流动的博物馆: 旅游民俗表演与文化景观的再生产: 以贵州丹寨万达小镇“非遗”展演活动为例[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2(2): 81-87.
- [26] 韦玲. 博物馆赋能民族地区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2023(6): 183-189.
- [27] 余青, 吴必虎. 生态博物馆: 一种民族文化持续旅游发展模式[J]. 人文地理, 2001, 16(6): 40-43.
- [28] 张成渝. 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两种实践: 解读生态博物馆和乡村旅游[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2(3): 35-44.
- [29] SUZANNE M, LAURA H H, JONATHAN H. Museum Making: Narratives, Architectures, Exhibitions[M]. London: Routledge, 2012.